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国外学术 认知缘起及话语建构

杨帆

[摘要]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国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渴望以及有力行动表现出浓厚学术兴趣及强烈学术关切。在从西方话语视角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学术分析后，生成一系列具有学术逻辑传承性与延续性的学术认知谱系，包括“移植论”“特色论”以及“超越论”等不同认知流派。这些不同学术认知流派既大致遵循中国现代化模式自身建构历程，又在观点的发展演进过程之中形成对应的学术交叉与论点交锋。如此一种学术观点表达的话语内容迥异而又能够形成具有内在发展逻辑的学术认知谱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外对此领域学术认知的历时性与共生性。国外学界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学术认知，一方面表现了相关话语进展，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其囿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万能论”“优势论”等学术与政治羁绊而对中国现代化模式造成的学术误读。要采用客观科学态度，理性分析和正确评价国外相关学术成果，并对其合理成分进行一定的学术借鉴。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话语建构

“模式”已经成为国外学术界观照与考察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学术视角。为了推进这一学术认知进程，一些国外学者将西方语境中表征着权力关系与规训的“话语”概念引入这一研究领域，力图建构国际化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新命题。就其本义而言，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国际化学术话语是指国外学者借助学术工具以及话语对中国现代化模式所生成的话语认知集合以及图景呈现。2002 年，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基于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赞同与理解态度，在对现代化所采取多种发展战略进行话语发掘以及表达认同时，着力修正国外学界对中国现代化进行单一叙述的学术话语结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挑战了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性的现代化。”^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国外学者而言，中国现代化模式成为具有值得展开学术表达与认知的现代性话语特质以及国际传播成效，并表现出一种现代性话语品质与可能实现的话语效果。

国外学界从学术认知视角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话语建构推动着这一学术话语认知体系的丰富、

作者：杨帆，南昌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研究员，fan-yang1112632@163.com。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央苏区调查研究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3BDJ114）；江西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红色基因传承的逻辑理路与运行机制研究”（22WT68）；南昌大学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央苏区时期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HSDD2304）阶段性成果。

^① Arif Dirlik. “Modernity as History: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Social History*, 2002, 27 (1): 17.

完善与演进。这对传统上惯于从“权力斗争论”“阴谋论”等行为主义政治学视角探究中国政治现象的学术惯例是某种意义上的“学术反叛”，表达国外学界不愿局限于仅从传统权力关系视角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进行分析与表达，而是更具创新性地将话语视角嵌入这一学术认知。国外学术界不仅着力探究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中国话语特质”，还关注国际性以及全球性话语要素在这一模式中的存在与体现。

反观国内，学界尚未特别关注到这一相关学术进展。国内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现代化海外研究现状及理论进程开展学术评析^①，并未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进行相应学术梳理和总结。基于这一学术探究存在的可能性，我们拟通过话语认知和建构视角，对国际上不同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学术表达及观点进行探究，以期经由纷繁复杂、芜菁并存的学术主张厘清其学术认知进程以及谱系构成，为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学术借鉴。

一、1960—1980年，国外学术认知缘起及话语出场

这一时期，尽管一些国家囿于政治意识形态束缚而对中国问题采用片面、机械的对抗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四个现代化”的追求依然使得国外学者感受到这个政党的巨大政治抱负与独特政治魅力。1966年，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就注意到，“‘现代化’这个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中国已经出现了部分现代化的活动”^②。现代化模式作为现代化活动的一般方式总和，使得国外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探索逐渐深入其方式与规律探究之中。1971年，卡尔·瑞斯金（Carl Riskin）率先基于“小工业化”视角着力探究由工业化带动实现现代化，并将其上升为“中国发展模式”探讨的理论高度，主张“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的小工业化以一种比较明显的方式推动了中国发展，并使得大众对中国发展产生了积极理解与认知，甚至推动大众开始思考中国在什么模式下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③。这表明国外学者已经将其认知视角转换至新结构主义政治学，表明在低现代化实现条件之下，发展中国家需要程度较高的适应性政治结构，并结合相应现代化实践与策略抉择，塑造具有一致性与共生性的现代化模式，进而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奠定基础。

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是这一学术认知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65年，史华慈在《现代化与毛主义视域——对中国共产党目标的几点思考》（*Modernisation and the Maoist Vision—Som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 Goals*）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发展愿景可以用西方话语概念‘现代化’进行指称，但是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整体一个重要构成部分。”^④在这里，史华慈比较早地表达了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特征进行学术认知的探究兴趣，并以较具代表性的话语框架对其进行学术表达。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构成及其话语特质被国外学界视为重点学术概念，并赋予其话语出场意义。

一方面，史华慈于1968年在《过去与现在：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认知》（*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一文中，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以图深入探究

① 国内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海外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优势以及理论体系等相关视角的学术进程展开评析，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梁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与世界意义——基于海外学者的视角》，载《科学社会主义》，2023（4）；赵斌：《海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基于海外中共学视角》，载《人民论坛》，2023（3）；刘静、彭随缘：《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及启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1）；姚立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海外认知及其启示》，载《社会主义研究》，2023（1）。

② Knight Biggerstaff. “Modernization and Early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6, 25（4）: 607.

③ Carl Riskin. “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971, 46（2）: 245.

④ Benjamin Schwartz. “Modernisation and the Maoist Vision—Som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 Goal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5, 21（1）: 4.

该政党对于中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定位与中国将以何种姿态面对世界。他认为中国将通过权力政治话语表达，借助务实性政治态度，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现代化秩序，因为“中国必须生活在一个持续的多极世界中，而且它已经逐渐适应这个世界日常基础”^①。但是，中国对于这一西方主导秩序真实态度如何？他觉得存疑。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中国模式”之中具有“威权主义巩固”要素。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主义”，提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以独特形式向社会大众进行灌输，使得他们必须作出适当话语回应。比如带有强制性的工业化计划，就成为国家权力压倒一切的目标，并使得中国工业化努力成为一种可能”^②。在这里，史华慈虽然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话语与社会话语互动，却未能明了这种互动是基于“四个现代化”目标得到广泛社会认同并成为社会集体认知前提下生成的。当然，这种学术认知的产生与当时西方社会思潮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与史华慈不同，马歇尔·古德曼（Marshall I. Goldman）基于制度比较政治话语视角，对中国模式源于苏联模式因素开展话语分析，主张“苏联模式可以为中国发展服务，这种模式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奠定了其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基础。在这种模式应用下，中国有效动员中国人民快速完成工业化任务，实现向工业化经济转变”^③，但是，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将苏联模式运用于中国情境，这样一种模式取得成果的秘诀就在于重工业发展以及高投资率，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知偏差。这表明古德曼意图通过深入探究中国工业化政策而阐明中国现代化模式来源，但是并未将这一政策之中蕴含的独立自主功能转化为充分展现“中国模式”话语图景的重要构成。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史华慈与古德曼等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究竟是缘起何处所进行的话语考察催生了国外学界关于这一命题的话语。通过这一模式的学术话语阐释，这些学者核心学术目标之一在于尝试清晰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的概念构成、理论蕴涵以及相关话语拓展。由此发轫，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马里乌斯·迈因霍夫（Marius Meinhof）、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Suisheng Zhao）、芝加哥大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学者关于这一命题的学术认知与史华慈等的话语表达之间隐藏着千丝万缕的学术关联。比如，杜赞奇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性学术认知就与史华慈关于国家社会互动学术观点之间存在相应关联。杜赞奇在《建构中华民族》一文中，已经关注到中国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与渴望。杜赞奇从“中华民族”理论建构出发，认为中国已经充分意识到“分裂性西方民族主义理论难以解决中华民族现代化问题，而这一话语表述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现代化理论之中”^④。据此可见，尽管杜赞奇未如前述学者一般深入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内部构成以建构相关学术认知的话语表达，但是，其仍然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建构主体——中华民族现代性实现问题进行相关话语表述，并建构与之对应的学术认知。

紧随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的话语出场，不同立场以及阵营的学术话语流派渐次形成，并生成自身的范式与特点。基于总体性，可以将其大致划分成为不同时期的三大阵营，主要表现为“移植论”“特色论”“超越论”。^⑤实质上，这三种不同立场以及内容迥异的学术认知，主要源自三大流派学者之间的话语差异。总体而言，其话语学术差异表现为：其一，“移

① Benjamin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87.

② Benjamin Schwartz. “Totalitarian Consolid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1 (1): 18.

③ Marshall I. Goldman. “China Rethinks the Soviet Mode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0, 5 (2): 55.

④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3, 30 (7): 1.

⑤ 当然，这样的理论区分主要是便于对国外相关学术观点进行学术谱系的梳理与归纳，其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难免出现交叉与重合。这在文中也尽量给予观照与阐释。

植论”注重考察中国现代化模式重点究竟是移植何种模式？到底是东亚模式还是西方模式？“特色论”和“超越论”重点强调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性以及超越性。其二，“移植论”忽略中国现代化模式创建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否定将其归属为创新性政治话语表达；而“特色论”和“超越论”则发现中国现代化模式之中“中国特质”的话语成分。相关国外学术认知总体构成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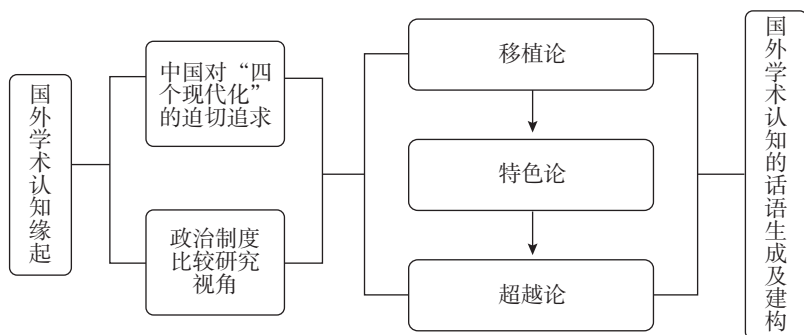


图1 国外学术认知总体构成

二、1980—2000年，以“移植论”为主要代表的国外学术认知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国外部分学者对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系列成就感到不可思议，渐次提出“政绩论”“威权驱动论”等主张，意图阐释中国取得巨大现代化成就根本原因所在，但其观点是错误的。在西方优势传统心理作用下，这些学者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取得重大成效原因探究逐渐聚焦于模式本身，并力图阐明这一模式来源，从而确证中国现代化成就的功劳归属问题。基于此，国外学界逐渐形成“移植论”学术认知。这种认知主要是指对中国现代化模式来源以及阐释围绕“外部移植”这一路径展开话语论述的表达集合与相关叙事范式建构。“移植论”既有相关学者在学术认知中对其进行直接话语概念阐明，也有不同学者在其论述之中进行相关隐喻表达。

在这一学术认知论阐释过程中，有学者通过考察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地区转移过程，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以及资源优势等，获得了相关产业输入。这种输入，不仅为中国“移植与搬用”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机会，而且也为其在东亚地区国际产业转移阶段中生成区域共生性提供可能。1996年，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东亚崛起：世界体系与区域趋向》（*The Rise of East Asia: World Systemic and Regional Aspects*）一文中指出：“东亚国家由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区域工业扩张带来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移植’机会。这些产业以及相关发展模式被‘移植’到更为贫穷以及拥有大量劳动力竞争优势的国家与地区，包括中国、越南、印度与巴基斯坦等。”^①

安戈（Jonathan Unger）和陈佩华（Anita Chan）基于社团主义这一东亚国家共同的群体表征来探究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移植来源问题，主张“中国发展进程之中越来越呈现‘国家社团主义的特征’，或可将其称之为国家社团主义发展模式”^②。这一论断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归结为国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Rise of East Asia: World Systemic and Reg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996, 16 (7/8): 27.

②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5, 33 (1): 52.

外学界划分生成的“东亚社团主义模式”，其学术认知话语指向清晰表明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东亚化程度进行话语探究，并确证中国现代化模式是从属于东亚现代化模式，同时将这种类型归属的划分较为简化地停止于表面，生成为国家社团主义模式。

1990年，威廉·伯德（William A. Byrd）和林青松合编《中国乡镇企业的历史性崛起：结构、发展与改革》（*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一书，对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工业化以及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给予了肯定。当然，这一肯定的话语实质是力图表现源自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效用。他们指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将数以百万计农民带入现代商品经济环境。而这种新环境造就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念，将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深远影响，并会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带来整体性新问题。”^①他们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的学术话语表达主要聚焦于中国农村落后性，并将其视为一种话语体验，以阐明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根本原因，进而深刻判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因素有效作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这实质上是意图强化西式现代化话语的东方式存在，并据此判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西方化特征。

大体来看，以“移植论”为主要代表的国外学术认知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980年到1990年。在此阶段，正值东亚经济迅猛发展之际，东亚模式的讨论成为国外学界重点关注。由于区域位置以及文化特质等共生性，国外学者首先倾向于从东亚模式结构之中探寻中国现代化模式建构诀窍。第二阶段，大致从1990年到2000年。在此阶段，东亚经济发展走向衰弱，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昔日高光的亚洲“四小龙”逐渐风光不再。而在这一区域当中，中国现代化发展表现出“一枝独秀”势头。再强行套用东亚模式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进行解读不再具有学术新颖性以及合理性。而海外学者又难以俯下身段，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探究这一模式的成效奥妙，只能用回归西方传统话语范式阐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西方特征，并得出“移植论”的结论。据此可以看出，“移植论”流派未能深入中国现代化发展情境之中进行学术认知，更难以对这一模式展开基于客观公正学术立场的话语表达。

与上述学者惯于从效用来源上探究中国现代化模式渊源相异，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注重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话语政治功能进行阐明。拉丰非常注重判明中国现代化模式中的经济现象背后隐含的政治要素，并赞成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治约束实践界定为不允许任何人参与的“共识决策”看法。据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价格自由化采取了过渡性质的双轨制，而未能采用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误政治约束”^②。拉丰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价格改革误认为国家权力对社会舆论以及大众话语表达的疏离与隔绝。因而，他只能基于政治功能主义视角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意识形态融合展开相应话语阐述。他提出：“尽管竞争政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比较小，但是事实上，竞争政策在中国有其独特制度特征以及话语表征。”^③这表明拉丰开始关注到这一模式话语阐释功能，并渐次通过务实性话语表述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政治立场进行论述，以强化改革开放在中国现代化模式形成中的作用与意义，并不时传递西方政治民主因素在这一模式中隐约存在的信号。

与此同时，白鲁恂（Lucian W. Pye）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追求进行回顾，发现无论是基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考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国家伟大以及现代化程度提升

① William A. Byrd, and Qingsong Lin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

② Jean-Jacques Laffont, et al. "The Dynamic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 (4-6): 1107.

③ Jean-Jacques Laffont. "Management of Public Utilities in China".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4, 5 (2): 207.

要求一直贯穿整体进程。他主张：“中国的现代化主义实质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植根于中国过去的历史，而将其激活或者调试出来则需要结合现代情感与意象。”^① 白鲁恂提出现代情感与意象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地导向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他看来，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开展学术认知，核心目标在于为确立西方现代化模式全球优势提供注解。这也契合“移植论”将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认知直接嫁接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运行基础上的话语习惯以及表达体例。白鲁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以一种含有消极因素的态度看待中国现代化模式，他也关注到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狭隘的制度方式下，产生了一个深刻而又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尽管渴望现代化，却没有成功？”^②

总体而言，可以发现属于“移植论”流派的国外学者尝试通过话语视角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西方式学术认知，以凸显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性。这种学术性尽管不容轻视，但是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包括：其一，上述学术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简单化与程序化，陷入为了强调西方现代化模式优势而选择刻意忽略和不顾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独特优势与发展历程。因此，这一派别的学术主张主要是将形态迥异、内容完全不同的中国现代化模式通过话语链接以归结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东方成就，以致少数学者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是全面西方化，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全面向西方化转变，其中表现为“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政治上开始远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话语修辞”^③。其二，少数学者过于强调与过度使用西方行为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国家决策、政治沟通以及权力多元等概念解读中国现代化模式运行成效，并对这一成效进行断章取义的取舍，将其成就归结为西方政治民主理念在东方情境中取得的成就，而将其不足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以及东方国家传统历史包袱，等等。

“移植论”学术认知进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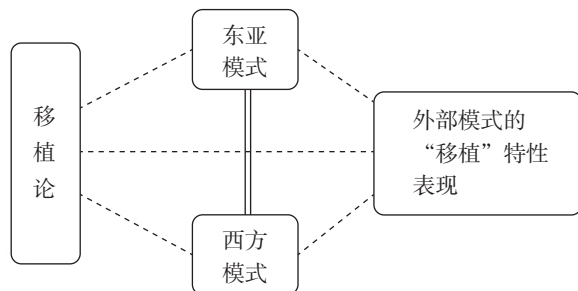


图2 “移植论”学术认知进程

三、2000—2010年，以“特色论”为主要代表的国外学术认知

国外学术认知“特色论”是指基于中国现代化模式运行实践以及发展历程，对其进行具有“创新性”中国特质阐释的话语主张以及相关话语内容集合。这一论调对“移植论”所强调与突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优越性以及普遍性进行质疑和批判，并力主探寻中国现代化模式“创造性”理论来源，以图为世界现代化模式提供多样化路径及发展渠道。有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提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已经建构一个独特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独特性集中表现为威权国家政权叠加自由市场以取得最大化经济发展效率，并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中国现代化模

① 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3, 29 (1): 109.

② Lucian W. Pye.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in Search of Chinese Real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132 (4): 1166.

③ Ben Kerkvliet, et al. “Comparing th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Reforms: An Introduction”. *The China Journal*, 1998, 40 (2): 1.

式是否会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①

这一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赞奇已经关注到具有全球价值意义的传统现代化范式正在走向理论破产，这可以称为“现代化的终结，抑或是历史终结的总结”^②，同时，他承认，随着全球化力量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学界对传统现代化发展范式信心已经动摇，过于强调当前全球化、现代化理论对世界发展意义不大。杜赞奇的论述为学界将学术认知投向于现代化模式独特性的探寻与建构开辟了理论空间，并渐次生成相关话语主张。2008年，杜赞奇在《中国国家形成中的全球化与区域化》（*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一书中，发现现代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一个现代化学术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现代化发展重大转向，即模式探究从文化主义探讨转向了民族主义研究，而“国家意识是民族共同体终极目标”^③。

这些话语主张都表明杜赞奇对现代化模式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批评，而力图建构一种东方中心主义现代性话语，并将其转化成为具有独特标识意义的、可以强化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质的话语叙述范式。这种话语叙述范式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认知束缚，并建构东方现代化智慧话语表达，进而有效消除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东方现代化发展实践之间的话语间隔。这也意味着杜赞奇跨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束缚，能够以和平理性的学术态度科学认知中国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为了确证这一点，杜赞奇主张，中国现代化模式不仅仅是社会治理以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路径与话语路径等，还存在着阐明“全球进程视域下中国独特发展”^④路径的价值。

紧随杜赞奇的学术推进，2006年，阿瑟·摩尔（Arthur Mol）在《转型期中国环境与现代性：生态现代化前沿》（*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Frontier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一文中关注到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在于其生态平衡性。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对西方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制度因素过程进行反思，发现其难以符合“生态现代化”理论框架学术要求，而这一学术议程有其可以适应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工业化国家。据此，摩尔主张：“尽管目前中国现代化战略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副作用，解决这一副作用的方法虽未稳定，但是，它还是迎来了国家经济总体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环保改革举措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模式支撑。”^⑤

由此可以发现，摩尔试图表达的“特色论”学术认知是一种具有生态文明性以及世界价值的生态现代化模式主张。这种学术认知实质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生态缺陷展开话语批判，并通过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关于生态环境破坏、全球生态危机显现等不足与东方进行对比，发现中国走出一条经济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平衡之道。这是对“移植论”学术认知展开一定程度的否定，并最终实现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功能最优化观点进行话语批判。对此，摩尔强调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生态特色性阐释。2013年，他在《转型中的中国环境治理》（*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全新环境治理模式正在将中国引向更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他提出：“尽管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创新与环境转型治理尚未充分解决环境挑战，但是中国环境领域治理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因为环境治理反身性提升了当代世界现代化制度水平。”^⑥他对“环境治理与现代化水平反身性”的深刻阐释，聚焦于诠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生态特色性对协调与处理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复杂关系的话语意义及治理价值。

① Suisheng Zhao. "The China Model: Can it Replace the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0, 19 (65): 419.

②③④ Prasenjit Duara.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Routledge, 2008, p. 3, 98, 5.

⑤ Arthur PJ, Mol.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Frontier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6, 37 (1): 51.

⑥ Neil T. Carter, and Arthur PJ, Mol (e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Routledge, 2013, p. 165.

在这一历史时期,有些秉承“移植论”的国外学者与上述学者相关论述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差别。有学者发现,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性,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重要命题,这也是现代化力量的外在显示。但是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进行追根溯源,可以将其视为西方现代化模式表现之一,因为“在趋同理论作用下,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以及财富总量增加,基于巨大全球化压力,其现代化价值取向将越来越趋同于西方文化”^①。这一学术认知仍然是基于“移植论”立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价值省察的话语预判;也意味着仍有少数“移植论”学者未能正视中国现代化模式运行成效,难以转变其西方中心主义认知立场。在短时间内,更不可能以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自身特色进行客观冷静的认知。当然,与早期“移植论”观点相比较,这一时期“移植论”总体上已经走向“间接移植”“趋同移植”等隐晦性学术话语表达。

“特色论”国外学术认知在经历自身观点成长与外部主张冲突之后,渐次生成了其主要话语特质:一方面,这一论断承认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实现区域化以及本土化。这一主张实质在于承认中国已经建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隐喻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万能论”“优势论”正在朝着逐渐失灵的认知立场转变。另一方面,更为注重以回归东方的方式理性建构非西方现代化模式学术话语认知。通过对“移植论”进行直接或间接话语交锋,阐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话语从“移植论”向“特色论”转变的时代背景以及实践依据,进而更为突出中国现代化模式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理论依据以及话语语境。

总体来看,尽管“移植论”学术认知力图以较大学术理性看待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但是,囿于学者学术出身以及学缘归属等,使得这一主张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学术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有学者主要是基于东亚共同体视角力主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性。其中,杜赞奇尽管力图摆脱西方现代化模式认知束缚,但是似乎在一定意义上又陷入了东亚模式至上的认知泥潭。他惯于从东亚地域视角出发对这一地区民族主义以及宗教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效用进行考察,指出:“在亚洲许多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宗教并不是排他性,而是被精英们视为创造了民族同质化与凝聚力基础。”^② 另一方面,有学者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性理论来源缺乏较为深入的关注与理论探究。对于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这一模式的逻辑关联和理论滋养,“特色论”未能开展充分而又深刻的学术话语认知。

“特色论”学术认知进程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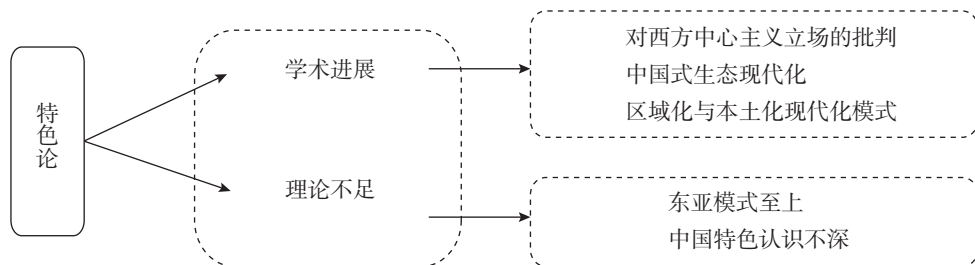


图3 “特色论”学术认知进程

① Kwok Leung. “Chinese Culture,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8, 17 (2): 185.

② Prasenjit Duara.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http://hdl.handle.net/10419/190144>, WIDER Working Paper, 2018 (95): 3.

四、2010 年至今，以“超越论”为主要代表的国外学术认知

所谓中国现代化模式海外“超越论”是指国外学者基于新时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取得重大标志性成就以及突破性进展，对这一模式“超越性”理论特质进行学术认知的话语集合以及内容体系。而这一模式超越性内容已经不再是早期对苏联模式以及东亚模式超越性表达，而是更为聚焦于对当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性核心指向更在于阐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自我超越与提升，以表征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现代化探索，从而为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成功建构发展新道路。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认为，“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尽管其不处于欧亚大陆中心，但并不妨碍其整体影响力。而‘一带一路’使得亚洲与欧洲成为贸易地理视域下的单一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中国，而非美国，是它的焦点。”^①

这意味着在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超越论”学术认知中，对以上“移植论”“特色论”等主张都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话语批评，并生成了内容体系更为精准的学术认知。2011 年，布思林（Shaun Breslin）在《“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一文中对这一命题表达了学术关注。他从全球金融危机整体性背景出发，关涉到中国是否已经形成具有独特性发展模式的话题讨论，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需要追随中国模式话语产生，以概述这一模式出现趋势。基于更为长远的历史角度来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可以看出中国模式是具有明显独特性以及具体国家特征的相对成熟国家主义发展道路。”^② 与之相关的话语内容催生了具有明显超越性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学术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外学界关于这一模式的认知视域。

布思林作为这一学术认知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是基于中国现代化模式对西方现代化模式超越而建构相关学术认知与话语表达，其关键学术认知在于借助话语表达而阐明中国现代化模式超越性理论来源。2016 年，布思林在《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China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从中国经济发展积极意义出发，探究“这一经济增长对地区政治结构的深远经济影响，并由此界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意义”^③。这意味着布思林的主张与杜赞奇等学者秉承的“特色论”在学术认知上具有相应话语一致性，二者都非常重视与强调中国现代化模式对世界特色性价值，进而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独特性进行较为深入的挖掘与话语总结。但是，“超越论”与“特色论”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独特性关注程度及其作用表现程度不同。“特色论”只是停留于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性话语叙述，并若隐若现地将这种叙述导向于区域模式优势总结。而“超越论”能够一直固守其就中国问题而阐释中国问题的认知初心，注重从学理深度上对这一模式特色性“超越效应”进行解读。据此，布思林关于经济增长对中国现代化在全球生产与金融体系中的超越表现的话语认知成为国外学界关于这一命题的重要学术表达之一。

与布思林注重从经济增长表现来解读中国现代化模式具体超越表现不同，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注重从文化软实力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中国现代化模式“规范性软实力”成为其经常提及的重要学术概念。他指出：“这种文化软实力战略强化了亚洲经济中心地位，并能够支持中国现代文明观与西方价值观进行针锋相对的冲突。规范性软实力使得国际社会发展会出现从西

① Maximilian Mayer. “China’s Rise as Eurasian Power: The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Maximilian Mayer, and Dreyer. *Rethinking the Silk Roa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Emerging Eurasian Relations*. Springer, 2018, p. 4.

② Shaun Breslin.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 87 (6): 1323–1324.

③ Shaun Breslin. *China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Springer, 2016, p. 131.

方化到东方化转向,中华文明将呈现出优于西方文明的表现,并有效增加全球现代化多样性。”^①柯岚安注重和强调“超越论”学术认知,重要原因在于他较为专注对中国现代化模式文化价值观进行效用审视。这种效用审视却被其他学者视为“第三次文明冲突”潜在表现而予以清除。与柯岚安学术认知形成话语互动,德里克也进一步提出要深刻厘清中国现代化模式超越性具体体现,并展开相应学术话语认知,因为“中国现代化模式既可以适应中国社会特殊性,又可以供其他国家模仿,因此,其具有超越中国社会界限相关性”^②。

与此同时,德里克力图继续沿着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全球化学术路径深入探究中国现代化模式超越性与“相关性”话语关联。他对“相关性”在中国现代化模式中的地位与作用开展相应话语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乐于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认知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究。2017年,他在《中国崛起与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一文中,看到由于自我放纵的消费主义以及对自然无限制过度使用,最终将导致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降临。基于世界末日与中国崛起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相关性,德里克点明这种超越性在全球南北分化中的具体表现:“一边是由于过度强调现代性而陷入这一陷阱,并在西方世界出现世界末日,一边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规模财富积累以及全球财富重新分配。中国崛起对世界南方社会不仅具有显著效应,而且十分重要。”^③

在这一时期,已经属于传统议题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对东亚模式超越性,还是被学者偶有提及。尽管到这时为止,中国现代化模式独特性以及东亚现代化发展经验超越性已经被世界所公认与接受,但是,仍然有学者力图通过对中国现代化模式东亚特质进行剔除,以期从话语溯源上创生中国现代化模式现实超越性。杜维明在其学术阐释中,根据文化特质论视角力图对东亚现代性共生关系给予更为深刻的把握,提出“东亚形式现代化可能是一个巨大复杂混合物,而不是一个充满了单线轨迹整体”^④。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中国现代化模式基于地域归属仍然会被外部误认为这一“复杂混合物”的构成,但是,同时也说明,面对与西方现代性整体交锋,是否可以将中国提升为东方现代化模式代表与优等生,并让其基于共生性与超越性现代性表现应对西方现代化挑战,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学术共识与类似话语表达。

由此可见,秉承“超越论”的国外学者,大都遵循以下学术认知逻辑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话语阐释,即这一模式主要是在与当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理论交锋中,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以及突破性成就,而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以及其他模式实现超越。这种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被视为自我进化与自我更新。但是,细审之,这一类话语表达学术认知也有其明显不足,主要包括:一方面,未能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超越性具体表现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考究。目前,国外学界对这一超越性具体表现未做过多实证研究,而多是对中国现代化模式成就的定性表达。这恐怕与其尚未完全摆脱“西方万能论”传统学术优势心理束缚有一定关联。另一方面,超越之后,中国现代化模式最终将会走向何处?对人类世界现代化进程普遍性价值如何?诸如此类问题,国外学者尚未投入更多学术精力与旨趣开展深入探究,而多沉溺于与现代化发展前景紧密关联的“东升西降”学术消极认知而不能自拔。

“超越论”学术认知进程如图4:

①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2035: From the China Dream to the World Dream”. *Global Affairs*, 2016, 2 (3): 5.

② Arif Dirlik. “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 A Critical Discussion”. *China Information*, 2012, 26 (3): 278.

③ Arif Dirlik.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merican Quarterly*, 2017, 69 (3): 533 - 540.

④ Tu Weiming. “Multiple Modernitie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Modernity”. In Leonid E. Grinin, et al. (eds.), *Globalistics and Globalization Studies: Aspects & Dimensions of Global Views*. Uchitel Publishing House, 2014, p.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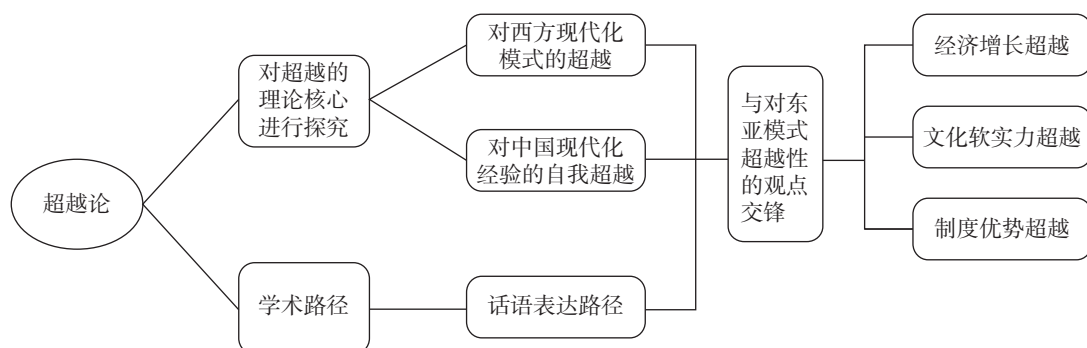


图4 “超越论”学术认知进程

五、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提升的路径建构

综观近几十年国外学界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学术认知的话语建构，总体而言，他们主要是从积极方面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进行从“移植”到“特色”再到“超越”的学术话语更新。这种更新既是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内在发展进程的学术肯定，也是对全球主要代表性现代化发展模式优劣之处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比较。但是，相关学术认知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学术不足既与学术意识形态有关，又与学术研究范式紧密相连。对其学术认知谱系展开审视可以发现，其话语一方面难以摆脱“西方优势论”心理羁绊，另一方面又难以全面转为从中国学术视角探究中国问题。据此，这对国内学者提出了提升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的学术使命以及需要承担的新时代国际学术责任。

其一，在实现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独特性与共生性平衡统一之间提升其学术认知。

国际学术共同体是具有相同或邻近学术价值指向、研究范式以及学术旨趣的学者基于共识性学术行为准则而建构的国际性学术群体。苏雷什·卡纳戈瑞迦（Suresh Canagarajah）强调指出：“学术是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与交往能力哲学中的建构主义及情境学习理念密不可分，因此，学术共同体是提升学术规范性的重要路径。”^①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内学术研究一定要机械地遵从国外学术研究范式，以“学术服从”换取学术认知，而是提醒我们，需要从这一命题研究中实现学术独特性与共生性平衡统一。学术独特性是指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质、学术贡献进行中国话语的学术解读而生成特色性认知。而这种特色性认知需要以更为自信的学术态度，阔步走向国际学术界，并得到其认可。这就表现为国内学术独特性向国际学术共生性有效转化，并实现二者平衡统一。这种转化是以“国际学术范”对这一研究命题进行学术呈现为前提，但是其学术内核需要保持明显与突出的中国特色，并不能一味地为得到国际学术认可而放弃自身学术创造与学术特点。就此来说，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探讨恰逢其时，具有深厚国际认知发展空间。这也要求关于这一命题的国内学术研究在运行机制以及世界价值等维度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更多优质学术产品。

其二，在兼顾中国现代化模式国际普遍学术诉求与小众学术诉求和谐共生之间提升其学术认知。

在提升中国现代化模式国际学术认知时，要格外注意摒弃一种错误心理，即认为只有得到大

^① Suresh Canagarajah. "Multilingual Writers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wards a Critic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2, 1 (1): 29.

国、强国学界认可，才是有效的国际学术认知，而将一些小国、弱国探究中国现代化模式、力图借鉴这一模式积极经验的学术兴趣排除在外。2021年，非洲学者范莎娜（Sara van Hoeymissen）在《非洲中国学研究》（*China Studies in Africa*）一文中表达了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开展近距离学术考察以汲取其经验与智慧的学术关切。她指出：“许多非洲学术机构已经开始为学者提供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培训，以满足各地对中国专业知识新需求。人类现代性作为动态显著标志，彰显着全球范围内学科地理边界新突破与新进展，这极大强化了非洲研究机构开展中国学研究的学术需要。”^① 这就提醒国内学界在提升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认知时，要注重观照与满足非洲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学术诉求。面对小国、弱国对这一模式学术诉求存在被忽视风险，国内学界可以以更为积极的学术互动、更为科学的学术范式以及更具有阐释性的学术话语体系，积极回应类似的小众学术诉求，推动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认知朝着更加客观公正的方向前进。

其三，在推进中国现代化模式运行机制与世界价值学术成果统筹兼顾之间提升其学术认知。

从更为宽泛视角而言，运行机制研究主要是指一种内生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中国语境下的学理研究。这是国内学界非常擅长以及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学术方向，但这远远难以满足国外学界深入了解与把握中国现代化模式学理规律的迫切学术渴求。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明已经为现代化变革做好了准备。这一准备为中国本土文化与外部世界信息互动提供了新元素。而国外学界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一直以来为努力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这一理解过程有利于强化中国文化与政治经验全球知名度。”^② 据此，国内学界可以将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研究重点之一设定为对其世界价值学术探究，也就是注重将中国现代化模式成功经验通过学术研究移植与代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这种外向性研究意图在于主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方面，可以结合国外现代化实践有的放矢地输出中国现代化模式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这种输出本身也是提升国外学术认知的重要路径。在输出之中，不同国家学者也可以有机会从本国语境出发加深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学术理解。

其四，在达成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话语精准分层与区域划分协调有序之间提升其学术认知。

要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及对外传播问题。而一国国内学术话语体系与国外学术话语体系是否对接和协调，已经成为其代表性学术成果能否得到国外学界学术认知的重要前提之一。2010年，帕特里夏·达夫（Patricia A. Duff）在《学术话语共同体中的语言社会化》（*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to Academic Discourse Communities*）一文中，对学术文化如何进入口头与书面学术话语共同体进行探究，并对学术话语如何建构社会意义、究竟是基于显性路径还是隐性路径进入学术话语实践等相关性问题展开学理分析，指出：“为了有效提升学术话语社会化以及互动化，需要进一步提升学术话语质量。”^③ 这些论述为国内学界相关学术成果进一步传播以提升国外学术认知有一定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要采取内外有别、精准分层以及区域划分总体策略：既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实践，又要结合和体现受众地区与国家话语特点及表达惯习；遵照受众地区与国家话语规范表达和传播中国现代化模式目标，做到“国内话语国内用、国外话语国际讲”要求，进而有效提升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信度与效度，并紧紧推进二者紧密结合与相互促进。

这一路径建构如图5所示：

① Sara van Hoeymissen. "China Stud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2021, 33 (2): 201.

② June Grasso, et al.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Routledge, 2018, p. 8.

③ Patricia A. Duf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to Academic Discourse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 30 (1): 186 -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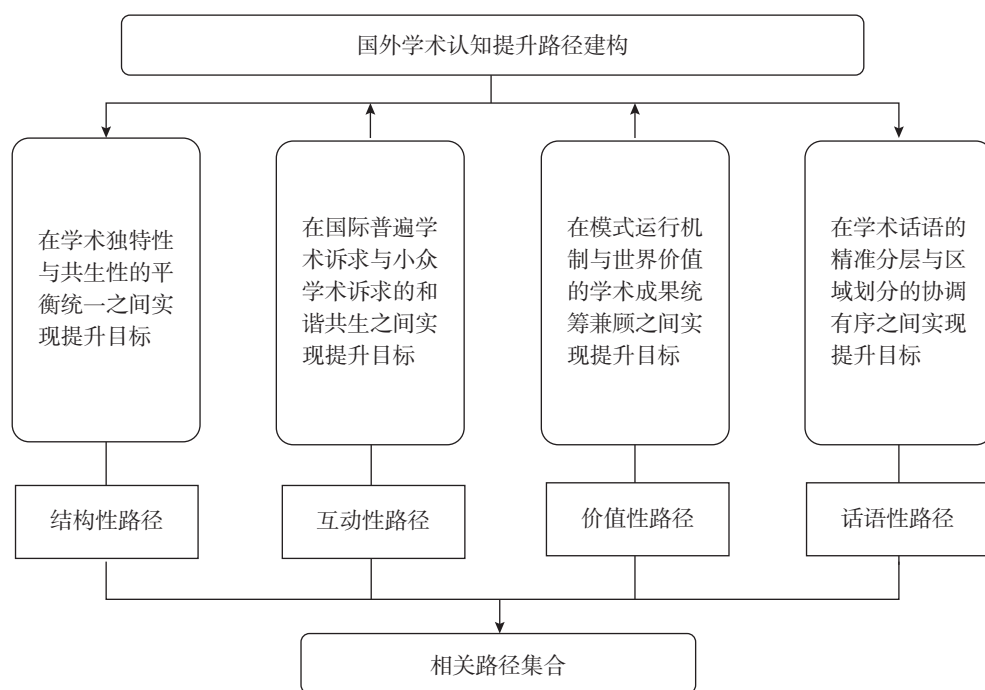


图5 国外学术认知提升路径建构

六、结论

对以“移植”“特色”与“超越”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的话语表现进行总览，可以发现，这些论述已经形成非常丰富的话语内容，并紧随中国现代化模式自身发展历程，而建构相应国外学术话语。当然，二者只能是总体上呈现正向关联，这是由于国内外学术差异以及学术议题更新速度不同，有时也会出现难以与国内现代化模式发展相匹配的学术逆流。但这些不仅无伤而且有益于丰富与提升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的话语体系。正如赵文词（Richard Madsen）所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是事关中国的大事，而且对整个世界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① 在这种重大意义激励下，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国外学术认知日益完善与体系化。

可以从以下主要方面对国外学术认知及话语建构进程进行回顾：一方面，国外学术认知中的话语肯定主要是基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运行成效。对于这一点，国外学者给予普遍性肯定：“中国现代化成效为中国人民发展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方式，据此，在中国现代化目前以及未来发展规划中，这些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形成了中国独特而又积极的价值观。”^②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创造性效用形成较为一致的积极认知。另一方面，还要对相关国外学者认知展开正确话语分析。其一，国外学界关于这一模式话语结构的认知主要是遵循以福柯等为代表的“话语—权力结构论”。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学术认知主要集中于其展开政治权力关系的话语分析，因此，有学者主张中国现代化模式主要是停留于经济层面的发展成效，而政治现代化则遥遥无期。这种观点的实质性错误在于还是用西方政治民主观来看待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实践，力图引出中国经济发展高速而政治改革滞后的错误看法。其二，国外学术认知

^① 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1993, 19 (2): 195.

^② Francis Soo. “China and Modern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a Discussion”.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1989, 38 (1): 49.

的纷繁复杂话语表达背后隐含着多样化政治立场与动机驱动。不同族裔、不同学术背景的国外学者对这一模式极有可能生成截然对立的研究结论，而这些结论之中又若隐若现地关联着学者自身学术利益以及学术意识形态。比如，有学者承认中国现代化模式民族化、本土化特质，而其观点主要意图在于将这一模式特质归结为东亚模式共生性。这就极大降低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特色性理论品质。因此，对诸如此类国外学术认知需要保持清醒的学术定力以及高度学术甄别力，并有效运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对其展开学术引导。

一言以蔽之，国外学界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话语视角下的学术认知建构已经进展得较为深入充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不同学术话语表达可以被视为国外学界最新理论进展。但是，这种理论进展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理论缺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其相较于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式而言还有尚未达到的理论高度，传统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对于国家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逻辑考察，就是这一理论缺憾的一个有力确证。这主要是因为国外学者囿于学术条件不足、研究资料匮乏以及研究手段差异等限制性因素，使其难以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基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更难以有效察觉到中国情境中的现代化模式话语建构的复杂性以及多维性。总而言之，国外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理论空间与可提升理论高度。

On the Origin and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in Foreign Academia on 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ization

YANG Fan

(Research Center of Red Gene Inheritance, Nanc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1960s, foreign academic world has shown strong academic interest and concerns for the urgent desire and strong a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aliz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have been shown by. Along with the academ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discourse, a series of academic trends have been formed, including the “transplanting theory”, “characteristic theory”, and “transcending theory”. These academic trends not only follow the self-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ization, but have also formed academic connections and confrontations in their development. The three theories of academic cognitive discourse about foreign academic world, on the one hand, shows the relevant progress of this research topic, on the other hand, expresses the academic misreading about 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ization caused by its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omnipotence theory and the superiority theory of the model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In a word, we should adopt an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to analyze and correctly evaluate relevant foreig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form certain academic references for their reasonable components.

Key words: Chinese model of modernization; Foreign academic cognition; Discourse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林 间)